

魯迅與瞿秋白

陳綏民

魯迅向左轉的緣由

魯迅是一位真正的讀書人，方正之士，不滿現實，他之所以被左派牽着鼻子，成爲早年上海左翼文聯的領導者，其因素非常的複雜，筆者特將他的轉變過程及其心態，根據很多原始資料及各種事證加以追述。史學家胡秋原評析魯迅由反共向左轉的兩大理由，頗有見地，謹摘錄如下：

(一) 首先中國知識份子高一層的，可以不愛金錢、不慕權勢，但是不愛女人的則很少，魯迅受妻子許廣平之影響至深，中共之善於利用女人來進行統戰，亦爲慣技之一。

(二) 名是讀書人知識份子所重視的，所謂三代之下，未有不好名者，顧亭林也說以名爲利則名重於利，名與時代潮流息息相關，當年正是歐美人士嚮往蘇俄革命成爲風氣，第三國際在中國正在大力傳播之中，史萊特萊啣第三國際之命要中共拉攏魯迅，捧他爲中國的高爾基，適當魯迅正在介紹俄國盧那卡爾斯基和蒲列汗諾夫有關文藝思想藝術理論方面的著作，再加上一個瞿秋白（曾任中共總書記）在幕後指導「文總」，並

爲魯迅牽線，影響其觀念與思想，牽線最重要的自然要數魯迅的學生馮雪峯（畫室）原爲湖畔詩社詩人，後來加入共產黨自命爲魯迅的傳人。對魯迅極盡奉承吹捧之能事，影響其改變立場參加左聯關係甚大。

所以魯迅的由反共到左轉的心路歷程是非常複雜的。我人必須把所有內幕加以揭穿，把魯迅有關反對共黨的事實與言論予以刊佈，使人們知道魯迅並非無產階級革命的文化鬥士。

瞿秋白對魯迅影響

另一個與魯迅同時，對魯迅影響甚深的瞿秋白，他們兩人生長的時代背景相同，都是五四時代的人物，在思想意識形態上，反封建、反軍閥、反帝國主義，不滿現實，喜愛文學，二人當年雖然都曾在「北平晨報」寫文章，但彼此並不相識，瞿秋白由「北平晨報」派到俄國作記者後，即開始轉變，後來成爲共產黨員。直到民國十六年以後第二次回到上海，才開始認識魯迅，於是爲魯迅介紹了許多俄國有關文藝政策、思想和文學作品方面的書，魯迅自與瞿秋白相交之後，大

爲欽佩的才華，瞿秋白雖是共產黨員，仍未脫書生本色，常以詩文自娛，在上海的文壇，瞿秋白與魯迅確有舉足輕重之勢，在左翼文聯與中共派的所謂第三種人——小資產階級文學——「反普羅文學」的一羣人，以戴杜衡（蘇汶）、胡秋原等的「現代雜誌」和「自由人」展開了激烈的論戰時，左聯是由易嘉（瞿秋白）主持，率領何丹仁（馮雪峯）、舒月、周揚、洛陽、徐懋康等上陣，魯迅僅從旁助陣，語調與態度較爲溫和，不似周揚一羣以打手姿態出現，一副文化流氓的形象，瞿秋白始終不滿周揚等的觀念與論調，指其爲「鬼臉的辯護」，是「左傾機會主義的觀點」，認爲謾罵近於無賴與無理性。

遭際相同結局異數

魯迅與瞿秋白聯合，迫使左聯的極端左傾盲目主義者，勉強同意文藝自由的原則，且自承機械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錯誤，中共與左聯因此對瞿秋白深懷戒心，對魯迅則暗存不滿與仇視。最後幾與魯迅破裂，周揚遭到挫敗，瞿秋白不敢再與魯迅聯手，被迫離開上海前往江西蘇區受毛澤東

與陳紹禹等之歧視與冷漠，瞿以紅極一時的總書記，一貶而為人民教育部部長，一直到他在福建長汀被捕，與魯迅始終藕斷絲連，在瞿秋白遭槍斃前夕，尚有信函給魯迅，希望設法挽救他一命。

瞿不願成為共黨的烈士。瞿秋白的信使魯迅最後與周揚這批人導致決裂。魯、瞿二人生長的時代相同，遭際相同，最後二人之結局卻不相同，魯迅病死，瞿秋白被槍斃。二人均為中共間接所害死。魯迅死後，却被中共封為文化鬪士與文神，瞿秋白死後，一再被批判，幾乎被認定為叛徒。近年莫斯科廣播特別推崇瞿秋白是真正馬列主義的信徒和傳播者，尤其對他和魯迅在三十年代領導中國文藝界宣揚國際共產主義思想加以讚揚。稱瞿為鬪士，對魯迅較為平淡。

瞿秋白、魯迅二人都已成為黃泉路上的孤魂野鬼，中共三十年來一切奴役人民的殘暴措施，爭權奪利的爾虞我詐，搞得人民和知識份子苦難不堪，有如生活在苦海地獄之中，假如他二人還活着，他們的良知不允許他們沉默下去，必會走出地獄之門，吶喊幾聲，喚醒人們的迷夢，最後也可能被批被鬪，但年輕覺醒的一代，會受到他們一貫反專制、反奴役的影響，點燃文藝的野火。燒盡大陸遍地的藜莽野草，使春風降臨整個的中國！

因之，談論與描述魯迅、瞿秋白這兩個人的往事，讓今天青年一代朋友們真正瞭解認識共產黨人的本質和真實面貌，不要盲目的崇拜，更不要盲目的在口頭上反共，必須實際投身於這一場關乎五千年中華歷史文化存亡，民族繼絕的戰鬪

之中。

魯迅的身世與個性

魯迅原名周樹人字豫才，生於民前二十九年（一八八一年）浙江紹興人，兄弟三人，兄周作人、弟周建人，原本紹興官宦之家，祖父與父親先後因遭滿清官吏的誣陷吃上官司坐牢含冤而死，家庭慘遭變故中落，依賴母親茹苦含辛，撫育其兄弟成人（因其母親名魯瑞故其筆名從母姓以資紀念），魯迅幼時聰慧好學，以第一名成績保送留日習醫，歸國後出任紹興師範校長，後應蔡元培之邀至北平教育部任職，同時在「北大」及「女師大」任教，「五四運動」後隨陳獨秀、胡適等提倡新文學運動，初寫雜文，繼寫小說「狂人日記」、「阿Q正傳」、「吶喊」，後在「北平晨報」副刊，寫「阿Q正傳」，一時文名大噪，被蔡元培與胡適譽為具有反封建時代意義啟發青年思想的文學作品。奠立了他在文化界的地位。

魯迅幼年因家庭受到滿清專制王朝官吏的欺壓印象極深，充滿了反封建專制殘暴和不满現實社會的心態，留日回國後看到北洋軍閥一切作為，一如滿清王朝的延續，女師大學生反對北洋政府對教育界的壓制風潮，魯迅因參予行動被免職，他認為北洋政府和當時社會一片黑暗沒有希望，除了為文諷刺抨擊外，乃離開北京跑到廣州，要參加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運動，同時在先總統蔣介石領導的黃埔軍校作了一、兩次的演講，對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繼續推行革命運動，推崇備至，民國十五年一度留在中山大學

任教，直至十六年後始離開廣州到上海。

魯迅其人在基本性格上，是不滿現狀、反封建、反官僚，帶有狂傲不屈的反抗性，不易妥協，但生平也嫉惡如仇，對國家民族和青年都有着一股真摯的熱愛，他在「九一八」「一二八」前後，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與中共在上海「文總」所提出的「普羅文學」、「國防文學」相對抗。他愛護由東北逃亡到上海的青年作家蕭軍、蕭紅以及關柔石、高長虹、許廣平、馮雪峯等一羣青年，指導他們寫作，幫助他們成名，凡和他接近的青年，無不熱愛着他，魯迅待他們一如家人子弟，於是圍繞着魯迅周圍形成了一個文藝集團，這個小集團除了馮雪峯曾參加共黨外，其餘的包括胡風在內，都是不帶色彩的自由作家，只是不滿現實而已。

魯迅本人在基本觀念上和思想意識形態上是崇尚自由，信奉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實現三民主義，所以他與中共遵奉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格格不入，他因而與共產黨人當時所倡導的「普羅文學運動」時相抵觸與抗拒。

當時他雖不是一位積極反共文藝工作者，但却決不是中共的同路人，因之，中共在上海的左翼文化人，視魯迅如眼中之釘，背上之刺，必欲拔之而後快。有人說，魯迅很早就就是共產黨和中共的同路人，完全是一種誤解。

中共在滬文化統戰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由於共產黨在鮑羅廷的唆使之下，阻撓北伐，陰謀奪取政權，

在南昌暴動失敗，國民黨實行清黨，國共分裂，原寄生於國民黨內之一批文化人有的逃往上海，如瞿秋白、周恩來、郭沫若、沈雁冰（茅盾）等，藉着外國租界的庇護，和共產國際的繼續支持之下，除了建立共黨在上海的地下組織之外，大力對文化界進行滲透與運用，以搞文藝藝術宣傳活動為中心，秘密的建立「文總」的指揮機構，成為文化統戰的總樞紐，先是由周恩來（時兼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瞿秋白（前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直接領導，（一度由馮乃超、潘漢年及陽翰笙出任文總書記）後由大夏大學出身，曾留學日本之周揚（原名周谷陽，別號起應，筆名周寬）繼任領導，周揚一九〇八年生，湖南益陽人，文革前曾任中共文化部副部長，他的旗下有四大金鋼（被江青稱文藝黑線領導的四條棍子）田漢、陽翰笙、夏衍、劉白羽等；文革時期被鬥，四人幫垮臺後復出，現任中共文協副主席，周揚為人機智、狡詐、陰毒、善變，當時在其文總領導下自各類不同的外圍組織，如郭沫若、成仿吾之「創造社」，蔣光慈、錢杏村、楊邨人領導之「太陽社」、丁玲主編之「北斗月刊社」，並開設「春葉書店」以及左傾日人開的「內山書店」（實際為日本情報機構所支持，專門與左派聯手以反國民黨為主）由沈瑞先等同時在日租界開北港設立一所「中華藝術大學」（未立案之野雞大學）

對上海的文化界，進行滲透、分化與爭取工作，這時共產黨提倡所謂「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即「普羅文學運動」，藉此口號與運動爭取文藝界的向左轉，想赤化整個的文藝界，這一企圖與

陰謀，因受到右翼與中立派的反擊而未果。這時抗拒共黨「普羅文學運動」的，無疑的魯迅也是中流砥柱之一。

激烈論戰發動圍剿

由於魯迅對中共所倡導之「普羅文學」加以藐視與批判，用一貫諷刺的筆調指出「普羅文學」連上海的黃包車夫也聽不懂，又挖苦他們在帝國主義的租界裏，請「資產階級」律師，掛個「普羅文學」的招牌，表示鄙視，於是「創造社」首先發難對魯迅加以攻擊，朱鏡我在「文化批判」第三期指責魯迅「似是而非的議論，不但混淆聽聞，而且還是一部份自鳴得意的資產階級思想之典型」。魯迅與創造社這批人決裂之根因，據該社後期中心人物王獨清的自述中指出：由郁達夫因反革命而驅逐了該社出版部的周全平與潘漢年（共產黨員，一直為中共統戰部工作，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認為係與魯迅有關，於是周揚領導之文總發動對他全面圍剿，由「創造社」與「太陽社」展開對他攻擊，指他是「資產階級的代表」、「封建殘餘」、「不得志的法西斯帶」，錢杏村曾以「死去了的阿Q時代」一文把他攻擊得體無完膚，在魯迅的自述中說：「到了上海，即遭到文豪們筆尖的圍剿，『創造社』、『太陽社』，連並不標榜文派的許多升為作家教授的先生們，也常常暗地裏奚落我幾句，以表明他們的高明，罵我是『封建餘孽』或『沒落者』，後來竟被判為主張生殺的棒喝主義了！」當時負責中共文化統戰的指揮者，是要拿魯迅來祭旗

，從魯迅頭上先開刀，認為不把魯迅打倒，「普羅文學」就唱不起來，因之，中共文總指揮下的所有外國文藝報刊，對他進行全面圍剿，同時囑令有關書店，封殺他的小說出版，迫使他此時只有寫寫雜文和翻譯高爾基與蒲列汗諾夫及何肇等有關文藝理論方面的書籍，在此一階段，中共此時則大量推出了「黨式作品」的創作，如茅盾的「子夜」、丁玲的「莎菲日記」、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蔣光慈「衝出雲圍的月亮」，有的一版再版乃至五、六版，此為中共文總曲意的安排，利用這一聲勢來壓抑魯迅在文藝界的權威。並以孤立分化譏諷打擊為原則，旋由「太陽社」之彭康以一篇「前奏曲」，用魯迅的譯文與作品來攻擊魯迅，其文為：走出「象牙之塔」，邁向「十字街頭」，坐在「華蓋」之下，「吶喊」了幾聲，因不能與羣眾結合，吶喊無力，是「徬徨」起來，產生「苦悶的象徵」，自己變成「阿Q」譯出「死靈魂」，結束他的一生。極盡諷刺謾罵之能事。繼之，又展開了「普羅文學」——「革命文學」與「民族文學」的激烈論戰，魯迅又轉入了這一戰團，周揚首先提出「現階段的文學路線與方向」，以及「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問題」，參加論爭左右兩翼陣線分明，另外是中立派的第三者，被中共指為第三種人，魯迅即其中之一，他是強烈反對中共所提出之無產階級的「普羅文學」，指出：「文學作品不代表任何階級，應該為大眾所接受與欣賞」，周揚旗下大將打手徐懋庸對魯迅作最惡毒的謾罵，並作人身攻擊，魯乃被迫還擊，指罵周揚為「奴隸總長」、「破落戶的

子弟」，罵徐懋庸是「上海灘的打手」、「文化流氓」、「一羣聽命的奴才」，他的門人胡風也出馬充當前鋒，雙方對壘，師徒二人與周、徐等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論戰。為時達四、五年之久，參加這一場論戰今天在臺的有梁實秋、孟什還、胡秋原、戴杜衡、鄭學稼、王集叢、王平陵諸先生，三十年代文藝界的轉變，是二十年代文藝界鬭爭的延續，魯迅確實是一個中心人物，他的轉變，是使三十年代中共文化統戰成功的一個轉捩點。

魯迅由反共到親共

魯迅初期雖不是積極的反共者，但也決不是中共的同路人或阿附者，他根本瞧不起周揚、徐懋庸這一羣牛鬼蛇神的文化流氓，而中共也視他為眼中之釘，全力予以打擊，他始終不屈服，以一貫高傲倔強的個性，為何在數年對立之後，在三十年代初一文之間突然轉變，向左靠攏！這其間經過非常的複雜而曲折，筆者早年在延安看到王若飛的日記（王曾任中共宣傳部長，三十五年與葉廷由重慶飛延安時飛機失事死亡）記載有關上海文化宣傳線上的往事、魯迅藝術學院成立的經過，以及其他有關資料分析。魯迅後來左轉的原因約有下列數端：

第一、由於中共中央策略上的改變。對魯迅由打改為拉的懷柔政策，採取「既聯合也鬭爭」，既打也拉，既捧又罵，中共囑命馮雪峯（為魯迅之得意弟子自命為魯迅傳人係共產黨員）作調人穿針引線，此時他的好友瞿秋白也有囑勸他（

瞿當時筆名「易嘉」，對魯迅頗為尊重）使其態度漸趨改變。

第二、由於與許廣平同居事件，引起其門弟子高長虹（為許廣平之愛人）等的攻擊與責難而背叛，心情孤寂落寞，此時沈雁冰（茅盾）、馮雪峯、丁玲等在許廣平身上下功夫，威脅利誘，形成對魯迅的包圍影響。

第三、因其得意弟子關柔石等八人之被捕與胡也頻等一道遭槍斃受到相當之刺激與衝動（其中四人為中共自己告密出賣，魯不知情），因而寫下弔關柔石等八人死難詩一首，其中四句是：「忍看朋輩作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臨罷低頭無處寄，月光如水照榴衣。」引起上海治安當局對他的不滿，導致他的誤會和憤激而走極端。

第四、促使他改變態度的最大推動者，是美國共產黨史沫特萊到上海後，一方面勸周揚等對魯迅盡量拉攏，同時親自拜會他，利用人性的弱點，當面捧他是中國的高爾基，應站出來領導中國的文藝界，史回到美國之後在左傾報刊上又加以力捧，使他暈陶陶，飄飄然，失去原來堅定的立場，乃開始向左轉了。所謂三代之下未有不好名者，魯迅也不例外（胡適語）。

在三十年代初期，中共所屬各種文藝團體，在文總策動下，發起組織所謂「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於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在上海正式成立，當時加盟有魯迅、茅盾、郁達夫、沈瑞先、馮雪峯、蔣光慈、馮乃超、王獨清、李初黎、田漢、陽翰笙、丁玲等五十餘人，大會除通過成立「常務委員會」及「理論綱領」，並通過十七

個議案，如成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發動左翼藝術大同盟組織」等。同時推舉魯迅為常務委員會主席，捧魯迅為「左聯」的盟主和旗手，由於他的參加左聯使很多原來中立者也盲目跟進（丁玲在魯迅逝世十週年時在延安「解放日報」撰文紀念詳述經過說：「由於魯迅的參加『左聯』才使很多人跟著參加的，他影響了當時整個上海文壇……」），自此，魯迅誤上賊船，身不由己任由周揚等操縱指揮，聽命擺布，可是內心對「左聯」的「太上皇」們反感殊深，時常發生矛盾與衝突，頗有悔意。據胡適在一次公開講演中說明魯迅被中共利用後來反悔，在答覆胡風、蕭軍二人詢問可否加入共黨一舉時發出其悔不當初之悲鳴，該函曾由魯妻許廣平在抗戰初期收集編入「魯迅書簡」，足徵胡適所言魯迅頗具悔意並非空穴來風。

中共力捧死者的經過

魯迅因參加「左聯」受中共之利用與控制，內心苦痛，抑鬱難伸，在民國二十一年後即對共黨對他一打一拉，一捧一罵的一套陰謀手法與詭計，有所瞭解與省悔，這時曾透過他的好友孟什還與南京的康澤密取聯繫，同時在二十四年瞿秋白在福建被捕後，曾有密函向魯迅求援，希望救他一命，瞿當時確有寧作「叛徒」不作「烈士」之意，並請魯迅照顧愛妻楊芝華，魯迅曾透過宋慶齡、邵力子設法營救，事為中共所悉，故當陳建中先生奉命前往福州爭取瞿秋白轉變之時，瞿曾寫下「多餘的話」，充滿悔恨之情赤裸裸的說：「

自己不是真正『布爾什維克』，而是一個懦怯書生，戴着政治假面具做了殺人放火的共產黨。」道出了他自己的「誤會」與覺醒。中共乃借刀殺人，在中央準備將瞿解南京之時，中共假駐軍之手，將瞿槍斃，臨刑前他寫下一首「浣溪紗」的自輓詞，哀艷悽絕，此事對魯之感觸最多，刺激也最深，因此到民國廿五年病倒之時，他與共產黨之間的裂痕與矛盾加深，幾至正面發生衝突，

死之前曾發表一短文說：「等我病情稍微好轉一點，我要揭穿共產黨的陰謀詭計和無賴手法。」是以他之死，是否共產黨對他動了手脚則不得而知，當其於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病逝上海，僅享年五十五歲，由徐懋庸的一幅輓聯：「敵乎？友乎？余唯自知。知我！罪我！公已無言」。

其幸災樂禍之情溢於言表，他與共黨的「奴隸總管」們和文化流氓是敵是友，只有彼此心裏明白，魯迅既死，只有含垢無言，任由中共胡說，反正死無對證，不過事實的經過可以得到佐證，就是當魯迅逝世之後，除了當時在上海發動左翼團體及羣衆數萬人參加送殯行列，之後即對魯死之事非常冷漠，當二十六年十一月胡風、蕭軍由上海撤退至武漢準備爲魯迅出紀念集及印「魯迅全集」時，向董必武（中共駐武漢代表）、郭沫若（時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請示意見時，被潑一頭冷水，不表贊同，又二十七年十月初在延安召集邊區文藝協會時，有人提議設立魯迅紀念館，周揚（時任甘陝寧邊區教廳長兼陝公校長）極力反對，後來還是由張聞元（代理中共政治局書記兼新華社社長）在中央工作會議提議成立「魯迅

藝術學院」，一方面藉以紀念魯迅，一方面可藉此號召一般文藝藝術工作者來歸，秦邦憲、王若飛、王稼祥、凱豐等全力贊成，同時電武漢周恩來徵詢意見表示同意，毛澤東只好見風轉舵，馬上表示贊成並將周揚由「陝公」校長調任「魯藝」院長，自此才開始大力吹捧魯迅，稱之爲文藝界的革命鬥士，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毛乃稱魯爲其親密的戰友、無產階級的文化戰士和文學大師，以提高毛自己其不學無術的身價，並追封他爲共產黨黨員，硬跟他戴上一頂紅色繆冠，披上馬列主義的臭汗衫，魯迅如果地下有知，對中共之專門利用死人（如瞿秋白、宋慶齡、廖仲愷）作宣傳搞統戰的鬼魅伎倆，會罵其無恥與無聊，笑其可悲復可憐！

死靈魂地下難瞑目

筆者述及魯迅從反共到左傾的經過歷程，不是爲他作翻案文章，只是爲他惋惜，他雖誤上賊船，心存悔意，他最後準備揭穿中共的陰謀詭計，和狼羣真面目時，不幸溘然長逝，任由中共拿他作工具與招貼，而無法辯白，還他一個清白的自由作家之身，假如他今天還活着，看大陸苦海中哀哀無告的芸芸衆生，他將爲成爲他當年所寫的「狂人」，爲苦難的「普羅大眾」而「磅徨」「吶喊」。可是他卻永留遺憾在人間，被中共封爲無產階級馬列信徒的文化鬥士，我們有責任爲他洗刷，揚棄紅帽子，拋掉舊汗衫，還他一個本來面目。

如果我們要對魯迅其人作一較爲客觀而公正

的評論的話，只有借用鄧小平貶毛「四六開」的三分法方式來加以分解：

- (1) 二十年代他參加倡導「新文學」運動和提倡「民族抗日文學」，反對無產階級的普羅文學，可謂「有功」。
- (2) 三十年代他參加「左翼文聯」，爲共產黨作旗手，爲虎作倀，助長共黨氣焰，使大部份文化人左轉，可謂「有過」。
- (3) 最後他明知爲共黨利用，瞭解他們的陰謀詭計頗有悔意，但未能及時毅然出來揭穿他們的真面目，乃至貽禍無窮，死後被人利用可謂「有錯」。

書呆子而不能安份

瞿秋白江蘇常州人，生於民前十七年（一八九五），在縣立高等小學畢業，即進入蘇州國學專修館讀書，在家鄉教了一年書，民國五年到了北平，他自己供述：到北平僅僅希望進入北京大學，研究中國文學，作一個教員度日，並無治國平天下的大志和任何政治野心，後來所有的發展，他說都是「歷史的誤會，壞在讀書種子，愛書本子，愛文藝，不能安份守己」，於是陰錯陽差考進了俄文專修館學俄文，初期練習閱讀翻譯俄國有關文學方面的書。跟着就接觸到馬克斯、列寧他們有關的理論和講詞，民國八年五四運動開始，他擔任俄文專修館的總代表，參與學生運動及政治活動，因而與李大劍等發生關係，參加他們在共產國際代表維丁斯基支持下所發起的「馬克斯主義研究會」，後來又接受「北京晨報」的

派遣到莫斯科去作通訊記者，連續寫了多篇報導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就與情景，由於瞿的文學根底相當好，描述生動，這一專欄通訊在晨報發表後，引起北京各界尤其青年們很大的迴響，無異為俄國在中國作宣傳報導。因此他和蘇俄共黨發生了相當良好關係，初期他本亦無意參加共產黨，後來看到列寧，列寧指出東方革命的遠景，和世界革命發展的關係，蠱惑瞿秋白應該為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中國，求得中國民族的解放，參加到反帝、反殖民地運動的革命行列，再加上因為作記者的關係，經常與俄共頭目們接觸，慢慢在意識型態上受到感染，於是在思想上逐漸的有所改變

，一九二一年俄共所設的「東方大學」開辦中國班，邀請瞿秋白前往任教，第二年他便經由共產黨員張太富的介紹，加入共產黨，接着他又出席了共產國際在彼得堡召開的「遠東民族代表大會」，會後的宣言便是由他和俄共沙瓦諾夫共同起草，之後他把共產國際和蘇聯共黨許多重要文獻譯成中文，著名的「共產國際綱領」，和共產黨的「國際歌」就是由瞿秋白翻譯的手筆傑作。可以說瞿秋白是馬列主義思想在中國的早期傳播者。

一九二二年底（民國十一年）陳獨秀、劉仁靜等到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瞿為他們擔任翻譯，並亦隨着出席，為中國代表團成員之一。由於瞿係一介書生而文采口才亦佳，特別受到列寧和俄共高級頭目們的欣賞，會後（一九二三年一月），陳獨秀即邀瞿一同回國，最初是擔任理論與翻譯工作，同時兼任于右任所辦

的「上海大學」的教務長與社會學系主任，由於他的社會科學與文學基礎好，頗受學生的歡迎，因之他對上大學生的思想影響相當深，後來上大學學生中的康生、饒漱石、胡也頻、丁玲等都先後參加共黨，而且成了中共重要領導人物。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在廣州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瞿秋白當選為中央委員，並任宣傳部部長，毛澤東也是此時進入中共中央，並竭力附和瞿秋白並加以力捧，因為當時國民黨執行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政策，李大劍親自上書總理，中共黨員願以個人身分參加國民黨的革命行列，一九二四年一月，由孫中山先生主持改組後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瞿秋白與林祖涵、張國燾、毛澤東等均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當選為正式中央委員的有李大劍、譚平山、于樹德，一九二五年（民十四年）一月中共在上海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瞿仍任中央委員，他在黨內的地位隨見上升，抱病主持共黨在上海等地的宣傳工作和幾個理論刊物，此時瞿已成中共的領導中心人物之一，歷史的錯誤使一個純文人爬上政治的階梯。

瞿的崛起與其沒落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而且是一九二七年（民十六年）中共在國際特務鮑羅廷，唆使共黨陰謀奪權失敗，將其失敗歸罪於陳獨秀，在中共於武漢召開五次大會，內部發生分裂，第三國際對陳獨秀的領導不滿，於是在「八七會議」上清算了陳獨秀，指責其領導為「右傾機會主義」，違反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改組中央成

立臨時政治局，由瞿秋白代理總書記，瞿秋白原為一純文人書生，一躍而為紅色舞臺上的主角頭號人物，於是在第三國際的命令指使下，發動了全國各地有名的「秋收暴動」，如「兩湖秋收暴動」——由毛澤東領導，「廣州暴動」——由張

大富領導，浙江「平湖秋收暴動」——由瞿秋白領導，陝西的「渭華暴動」——由劉子丹領導，最著名則為「南昌暴動」——由朱德、周恩來領導，中共此時受第三國際指使之所以發動各地一連串暴動之目的，主要為阻撓破壞蔣總司令領導國民革命軍的北伐，配合武漢左傾臨時政府，奪取政權，以期赤化全中國，為共產國際建立東方的最大革命基地，由於各地暴動為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軍配合各地組織及民衆相繼救平，共黨在各省的「農民協會」和「工團組織」被打垮，這一次共產黨所發動之暴動失敗，是中國國民革命的一個轉捩關鍵，否則中國早在一九二七年以後即已全部赤化，整個亞洲可能也改變了顏色。共產國際這一陰謀失敗後，把一切失敗責任歸罪於瞿秋白的領導錯誤，指責其為「左傾冒險主義」，使瞿作了代罪的羔羊，背上了「左傾冒險主義」的罪銜，於一九二八年二月被共產國際召往莫斯科，作了一番檢討與批判，不過史大林還是繼續支持他，並使他出席在莫斯科召集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和主席團委員仍留在莫斯科為中共駐第三國際代表，居住莫斯科將近一年之久，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共中央在莫斯科，由共產國際直接導演下，召開了它的第六次代表大會，在大會上與

會代表雖曾大肆批評過瞿秋白在領導上的錯誤，但由於共產國際仍然對他支持，所以批評歸批評，他依然和張國燾一起被任為中共駐第三國際的代表，此時他的愛人（太太）楊芝華也到莫斯科和他會面一道居住，在莫斯科居住期間，倒是非常悠閒清靜，沒有當年在國內時的你爭我奪的鬭爭不停，閒時翻譯了幾部俄國的文學作品，和有關共產國際理論方面的書，再加上他所心愛的楊芝華陪伴在身旁，每逢假日二人雙雙到莫斯科廣場及列寧墳前，作頂禮的膜拜，不過此時國內共產黨內部的鬭爭激烈，加上國民黨已北伐成功統一全國，看來共黨的大勢已去，自己原為一介書生，搞政治鬭爭，確屬外行，此時意興闌珊，無復當年高喊革命之豪氣。

回滬之後內心痛苦

在莫斯科居留了一年之久，時中共在莫斯科召開「六大」後，選出向忠發、李立三、周恩來、蔡和森、項英、瞿秋白、張國燾等七人為政治局委員並決定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府，瞿秋白、李立三等均奉命先後返回中國，瞿潛返上海之後，居住在法租界一層小樓中，已無實權，此時中共的頭目——總書記已換上由划船夫出身的向忠發，實際上則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宣傳部長李立三（湖南醴陵人）操縱把持，由於李立三宣稱根據「六大的決議」，採取盲動路線，主張實行工人暴動，要求各蘇區紅軍進攻城市，與工人在城市的鬭爭相結合，一九三四年二月廿六日的中共七十六號通告，即要求紅軍向中心城市發展。於是

在各個重要都市如廣州、漢口、長沙、鄭州、西安等地發動赤色工人罷工和武裝暴動，以漢口為總目標向國民政府所在地的都市展開進攻，實行暴力奪權，以期爭取一省或數省的勝利，執行所謂「立三路線」其結果和瞿秋白當年領導的農村「秋收暴動」，是徹底的失敗了，這時中共江蘇省委以何孟雄為首的一派，全力展開了反立三路線，指其亦為冒險主義，接着不久向忠發在上海被捕，這時共產國際派出了在莫斯科受訓的二十八個共產黨員——即所謂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王明（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楊尚昆、王若飛、王稼穡、陸定一、黃平、余飛、趙容（康生）等先後回到上海，一九三二年（廿一年）一月中共召開「六大」「四中」全會，改組了中央組織，國際派已掌握了實質上的黨權，由於中共中央久設上海，為了加強黨中央對各「蘇區」的領導與控制，乃決定設立蘇維埃區域中央局，該局在組織上與南方局、長江局地位相同，直隸於中央政治局，並將全國劃分為六個蘇維埃區。中共中央遷入蘇區後，所餘政治局委員，除赴俄之陳紹禹、陳郁、趙容外，僅有秦邦憲、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穡、陳雲、項英、任弼時、張國燾、關問應九人。這時的瞿秋白和李立三是同一命運，遭受了嚴厲的批判與打擊，不久李調莫斯科檢討察看，瞿則被擠出政治局之外，讓他不問黨事靠邊站，瞿秋白此時除了已在莫斯科六次大會時作了自我批評與檢討外，回到上海以後，仍然以待罪之身在閉門思過反省，有時在上海的左派報刊寫些雜文，間或也賦詩填詞來排遣當時的落

寞心情，恢復了他原來的文人生涯，他這時受到以王明為首的國際派的排斥，也因為如此，他非常同情魯迅遭受中共在上海文總周揚他們的圍剿，且常用化名在各報刊上為魯迅鳴不平，此時瞿秋白魯迅二人可謂惺惺相惜，因為二人基本上都是知識份子的文化人，瞿秋白雖然參加了共產黨且一度成為最高領導人，但文人的氣質未脫，不滿共黨內部權力鬭爭，加上不斷的受到共產國際的壓制與打擊，內心極為痛苦，有一度他二人曾聯合署名在報刊發表指桑罵槐的諷刺性文章，因是二人交往甚密，感情亦深，但瞿始終沒有勸魯迅加入共產黨，當魯迅與周揚們彼此論戰最激烈之際，瞿除了稍勸魯迅不必過份與周揚他們為敵，當中共打手們圍剿魯迅時，瞿始終未幫腔置一詞，當文總負責人發覺瞿秋白在袒護魯迅，中共在上海的領導人王明等即對瞿秋白提出了嚴正的警告，應與魯迅劃清敵我界限，不能沒有立場，就因為這一原故，中共當時領導權力人——陳紹禹、秦邦憲等藉口上海的地下組織相繼破壞，多數領導人有的被捕，有的潛往江西，於是中共上海當局，暗示上海危險，多數中央政治局委員已移駐江西蘇區，命瞿亦離上海前往江西。

與楊芝華的生死戀

瞿秋白出身文人，喜歡寫詩，喜歡文藝，感情豐富，自然更善於談情說愛，他從俄國回來後，曾與一位王劍虹的女人結婚，王劍虹在上海病死，他輓她的詩就非常的哀艷動人，在王未死之前，瞿對上海大學學生中非常欣賞該校的校花楊

芝華，楊風姿綽約，美艷動人，才華亦出眾，使這位年輕而風流的老師爲之傾倒，楊亦愛瞿的文采風流，很快的二人便墜入情網，可是楊已羅敷有夫，她的丈夫沈劍農，是中共早期發起人參加中共在嘉興南湖召開第一次大會的代表之一的沈文瀛之子，同時也是上大的學生，夫妻感情原本不錯，但自瞿楊二人相戀之事傳遍學校時，沈頗泰然，據說有一次楊芝華在瞿秋白房間裡，正當二人親暱的擁抱相偎時，沈劍農忽然闖入，瞿、楊頗爲尷尬不安，勉強解釋說：

「我們正在研究一個話劇劇本，準備演出。」

沈劍農也很大方的回答：「那你們就繼續研究吧！」然後關門退出。瞿秋白的前妻是否因此而氣死，不得而知，待王劍虹一死，瞿、楊二人即深深墜入了戀情的火海，如膠似漆，此時沈劍農只有讓賢，後來會有一則在上海的民國日報同時刊出兩個啓事，成爲轟動上海的新聞，一個是：「沈劍農與楊芝華的離婚啓事」，一個是：「瞿秋白與楊芝華的結婚啓事」。當瞿、楊結婚時，沈劍農也參加了他們的婚禮，並致詞說：「我把我最愛的芝華，獻給我敬愛的老師，願他們白頭偕老」一時傳爲佳話笑談。由此也可見當年上海歐風東漸的社會風氣和共產黨人的戀愛觀——一杯水主義——不過瞿秋白對楊芝華倒是純情的深深的愛戀着，當時他曾向他的朋友和同志們表示有了楊芝華今生於願已足，死而無悔。楊芝華與瞿秋白結婚後經由瞿的介紹參加了共產黨，因爲瞿早年就患有肺病（自一九一九年即吐血，時好

時壞），自與楊芝華結婚之後，楊對他照拂也無微不至，她在上海、武漢、莫斯科都與瞿秋白在一起，深情款款，而瞿秋白大有不能一日不從此君之慨，表示他不能離開楊芝華。可是在一九三二年之後，中共在上海的組織和機關相繼被政府所破獲，很多重要人員如向忠發等先後被捕，此

時中共中央大部份負責人如張聞天、秦邦憲、周恩來多已潛往江西蘇區，瞿最先不願離開上海，共黨深恐瞿秋白落到國民黨手裏，同時此時瞿的情緒不穩定，隨後他只有奉命被迫離開上海進入「蘇區」，共黨中央却拒絕他的要求讓他心愛的楊芝華同行，強迫其留在上海，給共黨主持特務的一個老廣「馮機關」作掩護，這對瞿、楊二人是最殘酷的打擊，硬是棒打鴛鴦兩離分，瞿到蘇區後僅出任蘇維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員會部長，但並無教育工作可作，當權的秦邦憲固然歧視他，野

心勃勃的毛澤東也一樣的冷落他，真是苦悶已極，每天在瑞金鄉下一間破廟裏除了拜拜佛外，就是和他所屬藝術局與戲劇學校的男女孩子們排排戲，以打發時日，可是他時時都懷念着楊芝華，但中共當權的國際派和在瑞金當蘇維埃主席的土皇帝毛澤東聯合的爲難他，把他要求中共中央讓楊芝華到蘇區來的請求加以駁回，只有讓他們兩地相思，永留遺憾在人間。據瞿秋白於廿四年在福建長汀被俘後所寫「多餘的話」自白書中坦白的說：「自己一生沒有什麼朋友，親近的是很少幾個，而且除開我的芝華以外，我對你們（按指共產黨的同志）也始終不是完全坦白和推誠相交的。」這說明作爲一個共產黨員是多麼可憐，不

敢有朋友，也不敢對任何人說一句心裏的話！相信今天從大陸投奔自由的所有反共義士們，都可以爲瞿秋白的這一句話作活的歷史見證人。

接着瞿又說：「我留戀什麼？我最愛的人，我曾經倚傍着她度過了十年的生命！……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親人，我唯一的親人，我如何不留戀？」他向當時奉命說服爭取瞿秋白轉變的陳建中先生（爲上海大學他的學生）說：「我在獄中常作夢看見楊芝華，因之常常午夜夢魂繚繞」。瞿寫有一首「夢回口占」的詩，表示了他的思念之情：

「山城細雨乍春寒，抖峭孤衾舊夢殘；

何事萬緣俱寂後，偏留綺思繞雲山。」

瞿秋白本來可以不死，據陳建中說：他奉命到福建長汀與瞿秋白晤談時，瞿的態度非常好，而且也很合作，極具懺悔之意，他向陳表示：他之參加共產黨完全是歷史的誤解，青年人好奇而衝動的錯誤決定，如果政府能原諒寬恕他，他將以餘生從事批判國際共產黨和馬列主義的思想行爲，以及中國共產黨的一切禍國殘民的錯誤。經過陳瞿二人有一個星期的懇切晤談，瞿最後表示：「寧作叛徒，不作烈士」，並寫下「多餘的話」，由陳帶回南京，待中央決定將瞿秋白押解命令到達前夕，可是駐軍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三十八年被俘後投共。接奉上級命令將瞿秋白就地槍決，這可能與他寫信給上海魯迅希望魯迅運用關係救他一命，消息走漏有關。

瞿秋白被槍決之事，楊芝華一直被蒙在鼓裏，並不知情，直到中共由江西流竄到陝北後，才

有人告知瞿已蒙難，楊聞訊悲憤不已，痛不欲生，由於瞿寫下的「多餘的話」對共產黨多所詆毀，而且有叛變之意圖，因此中共當時並不把瞿秋白當烈士看，對楊芝華亦極為冷淡，一直未派任何工作，而瞿秋白也一直在受歷史性的批判。當一九六〇年文革前夕，楊芝華在平閱居百無聊奈有感而發，曾賦有一首「長相思」的詞悼念瞿秋白：

「一思念，再思念，人渺天高閩江寒，相思楓葉丹。

紅豆開，紅豆殘，雁陣牽飛君未還，一簾風月閒。」

又有一首「謝新恩」和類似打油詩的詞：

「憶當年海上風波，空餘遺恨奈何，粉裝紅顏自悲感，東風惱我，羣雌亂舞，南海話夢留殘日，當年得恨何長，而今對鏡自憐，只留我一老太婆！」

就因為這兩首詞被江青指揮紅衛兵抄她的家，抄出這兩首詞，指其有反動思想，後來被發配到新疆下放勞改，直到江青四人垮臺後，始被解回北平，中共召開十二大時，楊芝華被邀出席，會後和王光美（劉少奇之妻）、浦安修（彭德懷之妻），被選為中共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委員，楊芝華與瞿秋白的這一段生死戀情，確屬最好的一部小說體裁，想不到瞿秋白這一純情書生，走上人生錯誤的第一步，誤入歧途，最後未得善終，死時不過四十餘歲，留下如花美眷，空餘遺恨到黃泉。

內部鬭爭患病消沉

當瞿秋白繼陳獨秀出任中共總書記時，毛澤東僅只是湖東地區省委，他曾經上書陳獨秀主張搞農民運動，被陳獨秀批責責毛對馬列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的無知，可是當「八七會議」時毛為出席者之一，他揚言湖南一帶有一百餘萬以上的農民協會會員，當時他曾向瞿秋白保證在湖南地區最少能動員十萬武裝農民，會後毛即以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及「中央特派員」身分被派往長沙指揮「兩湖秋收暴動」，可是他到達之後，一誤再誤，僅「平江瀏陽兩縣發動局部燒殺搶劫行動，最後毛且臨陣脫逃，以致失敗而毫無成就，使共產國際和共黨中央的整個計劃幻滅，所以在事後檢討，除處分湖南省委會各負責人外，特別提出毛澤東「應負嚴重的責任」決定開除毛的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這是中共歷史上瞿秋白與毛澤東最重要的一次合作，也是瞿對毛認識最深刻，瞭解其好大喜功虛偽陰狠最真切的一次，「八七會議」檢討所有暴動失敗，瞿秋白作了代罪的羊，他背着「左傾冒險主義」的歷史罪過包袱和罪銜，在中共「黨的歷史經驗」文件中一再出現，可是鄧小平們為了貶毛，似又有意捧瞿秋白的死靈魂來作擋箭牌，並為瞿秋白出專輯，蒐集他寫的有利於共產黨和涉及早期批判中共領導人人物的文章，以利今天當權派作宣傳。

瞿秋白於一九二八年到莫斯科出席了中共黨的「六大大會」作了自我檢討之後，在最後的一

段時期內，曾繼續寫了不少的小冊子，他曾為一本關於中國農民運動的書寫序，文中除讚揚彭湃（已死）之外，稱道彭為「廣東農民的王」，文中也照樣稱道毛澤東是「湖南農民的王」，他當時希望以較多的時間留在俄國作一點研究工作，但中共在「六大」之後，又發生「立三路線」問題，由於李立三「組織全國總暴動失敗」，大批幹部遭受犧牲，瞿秋白又被共產國際派回中國，這也是莫斯科給他一個翻身的機會，可是瞿於一九三四年九月參加中共在上海舉行的「六屆三中」全會時，他對李立三採取了同情與調和的態度，許多人又把責任推到他頭上，就把「左傾冒險路線」瞿李並列，此時也正是中共內部由上海以至「蘇區」內部權力鬭爭最激烈時期，上海並有共黨龐大的特務組織存在，先後由顧順章（後來在漢口被捕投誠，全家在上海法租界被中共殘殺活埋滅屍）、周恩來（當時在上海化名伍豪負責執行背叛黨徒任務）負責，除了為共產國際搜集情報，刺探政府的政事情外，進行告密，利用滲透政府的力量，予反共人士及存心背叛黨的予以打擊，瞿秋白看到這種情形，良知未泯深感煩惱與憤慨，一九三一年曾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請長假的要求，後來陳紹禹（王明）當權，盡量破壞在第三國際的信用，指瞿有動搖的趨勢，於是免除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由此瞿意志更為消沉，吐血症不時發作，所幸楊芝華對他體貼照拂無微不至，當時他為了不讓中共當權派認為自己消極而動搖，思想有問題，所以便與魯迅等人配合，參加左翼文化運動，希望在共黨陷於

革命低潮之時，以文藝的力量為共黨開闢一個「新的戰場」，瞿為着自己的安全，曾多次受到魯迅的掩護，也常常替魯迅捉刀寫文章，有時甚至兩人均用另一筆名聯合寫雜文，由於他有天才、有思想，對共產黨理論較有研究，所以魯迅批判周揚、徐懋庸等有關思想路線問題文章，多找瞿秘密商。因之魯迅非常重視瞿秋白，瞿秋白也非常推崇魯迅引為知己。

儘管瞿秋白在上海的左翼文聯起着相當的影響作用，使魯迅終能被共黨所利用，但共黨害怕瞿秋白落在政府手裏，因為他以往曾和國民黨許多人都有淵源，故最後便強迫他離開上海到江西「蘇區」，而且不准楊芝華同行。

一九三四年二月瞿秋白一個人孤孤伶伶的潛到江西瑞金，一直坐冷板凳靠邊站，除了掛一個人民教育委員會部長之名，曾一度兼任蘇維埃大學校長，實際不但無權，並經常處於毛澤東的土共和陳紹禹的留俄派、秦邦憲等的排斥，受着各種各式的折磨與打擊。

毛澤東逼他上死路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於政府圍剿，共軍大敗，中共中央決定突圍，在其主力退出江西根據地之時，中共所有重要頭目，組成中央直屬工作隊，隨軍西竄，却把一個正在患着嚴重肺病困頓中、毫無軍事常識的瞿秋白留在閩贛邊區打游擊。有人當時建議讓瞿一道隨軍突圍。但為毛等所否決，所以後來瞿要楊芝華在回憶中憤慨的說：「當瞿秋白離開蘇區時，就有托派向國軍告密」，

楊芝華描述：在紅軍決定突圍時，瞿秋白本來是收拾行李，準備隨軍西行，後來聽到中共中央決定留他在「後方」工作，只有無可奈何的說「我服從組織命令」，神色很黯黯，默默地與同志們握手告別了。言外之意，已經告訴人們中共當時有意讓瞿秋白作犧牲品。

當紅軍撤出江西後，政府迅即展開對共區的清鄉工作，殘留的少數紅軍游擊部隊被清剿，瞿秋白他們自然無法長期隱蔽下去，所以他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與鄧子恢（後來曾任福建省委書記及西南軍政委會副主席）、何叔衡（曾代表湖南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會）等化裝商人，準備由閩西南到廈門或汕頭，搭船轉往上海，在福建省武平縣之水口鄉被國軍三十六師宋希濂部逮捕，何叔衡被民團打死，瞿秋白被捉，鄧子恢一逃出，後來受毛澤東重用，因之有人認為這其中有很大的疑問存在，是否是毛的詭計，逼瞿一死。瞿秋白被捕後，中共中央曾命令當時留在閩贛邊區游擊的陳毅和張鼎丞以軍事力量進行搶奪，命令中說：「如果不能活着救出瞿的話，

須設法把他打死，不能讓他活着。」

瞿秋白被捕後押送長汀，他受到國軍極大的優待，在獄中寫詩、填詞、刻圖章以自慰，他與中央派去的陳建中先生曾作數夜的促膝深談。他非常讚賞宣佈脫離第三國際的日共頭目佐野學，一再表明願意以其殘餘的生命，用他的一枝筆，作為批評共產主義的武器，以及中共的一切暴行，他說：「共產黨已榨盡了我的心力心血，我的利用價值早已用盡，現在就剩下要我作他們的烈士——死後的一張宣傳的牌子，也像他們把憚代英（中共早期領導人）送到政府手裡殺了一樣。」政府當局也非常愛瞿秋白之才，希望他能轉變，為國効力，可是等中央命令到達先一日，因陳毅、張鼎丞兩股共軍的竄擾，駐軍為安全起見，將瞿槍決，終於實現共產黨借刀殺人的陰謀，這也是毛澤東等人對這位曾經提拔他們、支持他們的老同志的唯一報酬吧！使他在臨死前留下一首詩，最後兩句：「此去冥泉無歸路，獨留青塚向黃昏」的感嘆之詞！一介書生，正值中年，結束了他半生的悲劇！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三

寸草悲

徐櫻女士著
定價壹幣捌拾元

本書係旅美名作家徐櫻女士精心傑作，思親、懷舊、憶往，附珍貴圖照多幀，內容精彩篇篇可讀。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